心理学报 2021, Vol. 53, No. 9, 1003−1017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1.01003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田 一[1,2] 王 莉[3] 许 燕[2] 焦丽颖[2]

([1]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6)
([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3]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为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研究采用人格词汇法, 在开放调查收集的词汇中选取代表社会善念的心理词语, 确立了社会善念词库。通过两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得到包含 18 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和包含 17 项描述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研究表明, 中国人的社会善念是一种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的人际特质, 二阶是指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 四因素分别是善良尊重、谦和恭逊、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

关键词 社会善念; 心理结构; 词汇学方法; 中国文化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由荷兰自由大学研究团队最先提出(van Doesum et al., 2013), 最初被直译为社会正念。研究表明, “社会正念”与正念注意意识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所测的正念水平没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van Lange 和 van Doesum (2015)也提出低的“社会正念”相当于“社会敌意(social hostility)”, 而社会敌意对应的名词是社会善念, 而非社会正念。国内已有学者将 social mindfulnees 的翻译改为了“社会善念” (窦凯, 刘耀中 等, 2018; 窦凯, 聂衍刚 等, 2018)。考虑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友善”的诠释, 以及正念的佛学教义所产生的歧义, 本研究认为“社会善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 更具中国特色。

社会善念的测量方式源于笔选择范式(Pen-choice Paradigm) (Hashimoto et al., 2011; Kim & Markus, 1999), 该范式要求个体在 2 种颜色的 5 支笔(例如 1 支红色笔和 4 支绿色笔)中选择一支。van Doesum 等(2013)受此范式的启发, 开发物品选择游戏作为社会善念测量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简称 SoMi 范式), 将选择非唯一物品的行为视为社会善念。该范式充分反映了个体做出顾及他人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包含了善意关注他人控制结果的技能和意愿(van Doesum et al., 2013)。研究者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将社会善念界定为, 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善意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需要和权利的倾向(van Doesum et al., 2016)。国内学者认为社会善念是一种心智技能(即关注他人可支配的选择)和意愿动机(即愿意做出不限制他人选择的决策) (窦凯 等, 2017)。笔者认为社会善念是一种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 在人际互动情境中表现为: 能感知他人状态、尊重对方选择, 同时愿意做出选择权的让渡(田一 等, 2020)。

以上均是从行为状态的层面来解释社会善念。也有研究者将其概念化为反映动机状态和稳定行为的基本取向, 既可由人际关系或情境激活, 也可作为个性变量位于个体内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它既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特质(窦凯 等,

收稿日期: 2020-08-23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671160)、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重大课题(KXTXT2016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63)资助。
田一和王莉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许燕, E-mail: xuyan@bnu.edu.cn

2017)。实证研究也表明了社会善念既有类状态的特征，又有类特质的特征(Mischkowski et al., 2018)。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善念的外在表现恰恰是内心稳定的人格特质所决定。

当前，国外对社会善念的研究更多采用 SoMi 范式探究其与人格变量、认知变量，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关系(Mischkowski et al., 2018; 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6; van Doesum et al., 2013)。而国内将 SoMi 范式用于探讨个体社会善念与道德、催产素的关系(陈满琪, 2016; 陈琪 等, 2020)，探讨感知社会善念促进合作行为的路径机制等(窦凯, 2016; 窦凯, 刘耀中 等, 2018; 窦凯, 聂衍刚 等, 2018)。总体而言，国内关于社会善念的研究尚处于概念引进与跨文化验证阶段，本土化与原创性研究较少。在中国文化视角下，有针对性且全面地探索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方面仍有较大空白。

前述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表明，它的利他选择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互动模式，会影响个体对利他选择的不同推断，进而影响其社会善念的表达(任彧, 2017)。目前，全球关于社会善念的跨文化研究正在进行，以期待可以在不同国家层面得到更好的解释(van Doesum, 2016)。因此进行社会善念的跨文化研究非常有必要。

1.1 不同文化下的社会善念

首先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差异切入。结合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 (Higgins, 1997), van Doesum 等(2013)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防御定向(prevention focus)，不给别人添麻烦(Hashimoto et al., 2011)，保持现有的好名声，预防自私选择损害个人形象，即中国文化下的“面子”问题。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 (Higgins, 1998; Lockwood et al., 2002)，即为他人考虑的选择，可以使其获得积极的认可或自我奖励。

中国文化的本质毫无疑问是集体主义的(杨国枢, 俞宗火, 2008)，更具体地说是垂直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Triandis, 1995)。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文化心理学领域广为应用(蔡华俭 等, 2020)，同时，两者也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维度。但中西文化差异包括很多维度，不能简单地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差异来解释。Hofstede (2001)的文化差异研究将其分为个体/集体主义、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男/女性化四个维度。梁漱溟先生(2010)从唯识学的知识论(现量、比量、非量)解析东西方文化思想，从不同的路径思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由此，研究尝试从中西方文化的宏大视角剖析文化差异对社会善念表达的影响。纵观中西方历史长河，中国从最原始的农耕时代开始，历经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儒家思想占据上风，后经佛教、理学、心学，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思潮涌动(常乃悳, 2019)，但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思想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善念表达，例如传统的长幼尊卑、人情面子、中庸调和等，会使个体在表达社会善念的时候，更多考虑他人感受，避免因不照及他人而丢了面子，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但是西方文化，以“向前的路向”征服自然，追求科学和民主(梁漱溟, 2010)，历经希腊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直至卢梭、康德、杜威等现代哲学思潮兴起(罗素, 2016)，使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根深蒂固。随着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更加促进了西方人追求自由，凸显个性的价值取向，故而西方文化所浇灌的思想促使个体在表达社会善念时，更多会遵从本性，不过多顾虑面子，但为了维持与他人的互动合作，会积极主动地让渡选择权利。

综上，虽然中西方文化下，个体均会做出社会善念表达，但本质的行为动机不同，所反映在人格特质上也会有所差异。由此，研究需结合本土化研究和中国人人格特色探索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1.2 中国文化下的社会善念

首先，中国文化下的心理学研究非常有必要(杨国枢, 2004)，中国文化下的人格建构更加重要。中国人格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本国文化，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到生活实践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关人格心理学的问题(黄希庭, 2004)。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乃至人格特质，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特殊性(张建新, 周明洁, 2006)。

其次，结合社会善念的人际特点，需要考虑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特色性，即人际关系性。梁漱溟先生(2010)指出观察文化的方法来源于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是基于血缘和家庭所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在通过关系和集体来界定自我的中国文化氛围下，人际取向的人格理论是研究中国人人格特质的重要基石(黄飞 等, 2010)。王登峰和崔红(2005)开发

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 其中包括了中国人特有的人格维度——“人际关系性”, 即人情、和谐性、面子等。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丰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 体现了中国文化下的人格构念, 显示出中国人社会交往模式及其文化内涵, 如讲究往来人情、维持表面和谐、有里有面等。这也充分说明了人际关系性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格特质的传统因素(张建新, 周明洁, 2006)。

综上, 有必要全面探索和建构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明晰其内涵, 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Allport 和 Odbert (1936)指出“所有的人格特质都会被编码到自然语言中去”。因此, 研究尝试采用人格词汇法来探索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该方法是人格心理学中对特质心理结构探索的最有效方法, 不仅可以探寻其内部结构, 而且可以编制相应的问卷或量表。例如有研究者采用该方法探究谦恭的结构(Weidman et al., 2018)、美德的心理结构(Cawley et al., 2000)、谦虚人格的结构(Shryack et al., 2010; Xiong et al., 2018); 探寻中国人的人格特点(王登峰, 崔红, 2005)、善良人格以及善恶人格的结构与内涵 (张和云 等, 2018; 焦丽颖 等, 2019)、特质敬畏的人格结构(赵欢欢 等, 2019)等。研究拟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通过开放调查收集相关词句, 以期从词汇和自陈描述的角度探索并验证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编制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的测量工具。

研究基于我国“人之初, 性本善”、“勿以善小而不为”等传统思想, 响应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导向, 深入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以期促进该领域在中国文化下的理论研究, 为我国道德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 1: 社会善念词库的确定

2.1　研究目的

通过开放调查、词汇研究的方式探索社会善念的内涵, 确定社会善念词库。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访谈样本: 6 位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具备高级职称的心理学领域专家。

开放调查样本: 社会人员 154 名, 来自于教育、金融、IT、医药等行业(M = 35.01, SD = 7.74)。国内 4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 381 名, 来自教育、心理、金融、体育、管理学等专业(M = 20.72, SD = 1.04)。

词汇评定样本: 43 名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 以及 232 名非专业社会人士(M = 30.90, SD = 9.09)。

2.2.2　研究程序

研究者邀请心理学领域专家进行访谈, 先通过场景举例的方式引出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对专家访谈以下两个问题: 您认为具有高社会善念的人一般具有哪些特征, 可以用词汇或语句来描述说明。您认为具有低社会善念的人一般具有哪些特征, 可以用词汇或语句来描述说明。

然后, 通过问卷星平台和纸质问卷对社会人员和高校学生进行开放调查。要求被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您认为高社会善念水平的人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会有哪些表现? (用简单句子描述, 或者举具体事例说明)。您认为低社会善念水平的人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会有哪些表现? (用简单句子描述, 或者举具体事例说明)。请您列出能够描述社会善念内容的词语(至少 9 个)。

在开放调查结果的基础上, 请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 对编制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进行 5 点评分(1 = 非常不符合, 5 = 非常符合)。

2.3　研究结果

2.3.1　访谈和开放调查结果

研究者和 1 名心理学教师、2 名硕士研究生将 535 名被试和 6 位专家关于社会善念的特征描述提炼出来, 形成相应的典型词汇, 采用词频分析法进行分析。首先对所有 4528 个词汇绘制词云图(如图 1 所示), 频率更高的词显得更大。

图 1　被试所产生的社会善念相关词汇的词云图

然后进行基于 IF-IDF 的词频分析, 得出综合排名前 10 位的词汇: 善良、尊重、思考、换位、他

人、理解、助人为乐、宽容、包容、设身处地。参考此结果，又采用 SPSS 20.0 对词汇进行频次分析，选取频次在 4 次及以上的词汇，在两者结果的比照基础上，进行同义词、近义词的整理，并对怪异词汇、偏僻词汇、非心理词汇、争议比较大的词汇进行了删减，最终形成 142 个反映高社会善念的词汇。此外，将描述低社会善念者的 595 个词汇进行如上分析、整理、删减等，最终形成 66 个反映低社会善念的词汇。

最后以这 208 个词汇为基础，参照国内关于人格特质研究的相关量表(焦丽颖 等, 2019; 沐守宽, 2007; 王登峰, 崔红, 2005; 王萍萍, 2011; 张和云 等, 2018)，进行修改、合并、删减，最终形成 83 个社会善念词汇，其中包括 59 个高社会善念词汇和 24 个低社会善念词汇。

2.3.2 词汇评定结果

在开放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请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对基于 83 个词汇所编制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进行 5 点评分(1 = 非常不符合, 5 = 非常符合)。基于两组被试的分析结果，保留评定全部都在 4 分以上的词汇 55 个，删掉所有在 3.5 分以下的词汇 11 个，对于在 3.5~4 分之间的 17 个词汇暂时予以保留。

由研究者和 2 位心理学教师，对保留的 72 个词汇，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再次进行同义词、近义词合并，借鉴相关词表与问卷(焦丽颖 等, 2019; 沐守宽, 2007; 王登峰, 崔红, 2005)进行再次整理，例如“公正的”、“公平的”、“正直的”，讨论决定合并为“公平正义的”；“谦逊的”、“谦恭的”，讨论决定选择“谦恭的”。最后筛选出 42 个词汇，邀请 2 位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专家研讨，对部分词汇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包含 40 个词汇的社会善念词库，其中包括 36 个高社会善念词汇和 4 个低社会善念词汇，以降低被试的默认反应偏差和不认真随机作答等行为。

由此，确立包含 40 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库。

3 研究 2: 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及词汇评定量表编制

3.1 研究目的

基于研究 1 得到的词表编制社会善念词汇量表，探索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同时形成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平台招募，删除存在正向词和反向词作答一致、作答速度过快或过慢、所有题目选择同一选项、随机有规律作答等问题的被试。样本一：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实际被试 368 名，有效被试 351 名。男性 170 名，女性 181 名，年龄 18~60 岁(M = 27.05, SD = 8.29)。样本二：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实际被试 326 名，有效被试 307 名，男性 223 名，女性 84 名。年龄 18~56 岁(M = 26.14, SD = 7.28)。

3.2.2 研究程序

首先，编制包含 40 个人格特质词的初测社会善念词汇量表，要求被试从 1 到 5 级评定这些词汇符合自己日常心理或行为的程度，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对样本一进行施测，采用 SPSS 20.0 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指标不好或模型拟合不佳的项目进行删减，最终形成 18 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汇量表，探究社会善念的结构维度。

然后，编制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Social Mindfulness Lexical Rating Scale, SMLRS)，效标工具采用 HEXACO 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分量表(Lee & Ashton, 2018)、一般信任问卷(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人际反应指数的观点采择和移情关怀分量表(Davis, 1983; 戎幸 等, 2010; 张凤凤 等, 2010)对样本二进行施测，采用 AMOS 20.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 SPSS 20.0 进行一致性信度分析，以验证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3.3 研究结果

3.3.1 项目分析

基于经典测量理论以高低分组差异检验 t 值和题总相关系数 r 作为区分度指标，分析各个项目的区分能力。所有项目鉴别能力和题总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故项目分析不进行删题。

3.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初测社会善念词汇量表进行分析。KMO 值为 0.96, Bartlett 球性检验结果显著(χ^2 = 8337.84, df = 780, p < 0.001)，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优斜交转轴法对 40 个词汇进行因素分析，发现共有 6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解释总变异率达到 60.60%。基于心理测量学原则，先删除在所有因素上载荷值都很低(小

于 0.40)的项目, 然后删除跨因子载荷量(即重叠的最低载荷值)最大的项目, 最后删除少于 2 个项目的因素。每次只删除一个项目或一个因素, 然后再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经过反复循环后, 最终保留 18 个项目。对这 18 个项目进行碎石图检验, 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有 3 个因子, 累积解释总变异达到 60.36%, 特征值到 4 以后开始平缓。同时, 各项目载荷值在 0.55~0.90 之间。具体因子载荷和共同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社会善念词汇量表的三因素结构表

项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共同度
有礼貌的	0.90			0.75
尊重的	0.86			0.70
有责任感的	0.86			0.70
诚信的	0.85			0.59
通情达理的	0.69			0.63
善良的	0.66			0.61
谦恭的	0.55			0.55
包容的		0.71		0.50
共情的		0.67		0.43
换位思考的		0.58		0.50
乐于助人的		0.60		0.65
礼让的		0.75		0.67
利他的		0.79		0.48
外向的			0.89	0.60
信心的			0.79	0.66
积极主动的			0.65	0.63
乐观开朗的			0.62	0.61
胸襟开阔的			0.61	0.61
特征值	8.27	1.38	1.22	
贡献率%	45.94	7.64	6.78	
累积贡献率%	45.94	53.58	60.36	

注: 因素负荷值低于 0.40 者没有列出。

3.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研究采用 AMOS 20.0 对三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探索模型的合理性, 结果表明, 该模型的 χ^2/df 小于 3, RMR 小于 0.05, GFI、IFI、TLI、CFI 均大于 0.90, RMSEA 小于 0.08, 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具体模型结构见图 2。

但相对于其他因素模型, 该三因素模型是否是最优模型结构, 需要进一步验证。基于概念理解, 将所有词汇合并成单因素模型; 鉴于 S1 因素和 S3 因素反映的更多是个体品质, 故合并成一个维度, 形成双因素模型 1; 鉴于 S2 因素和 S3 因素侧重于对他人有直接影响的品质, 故合并成一个维度, 形成双因素模型 2。依次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三因素模型拟合表现最好, 单因素模型和双因素模型 2 统计学指标表现较差, 双因素模型 1 虽然比较接近三因素模型, 但是整体稍逊。综合考虑, 三因素模型是比较稳定优质的模型。

对三因素模型所包含的词汇和内涵进行分析命名: S1 因素包括诚信的、谦恭的、善良的、通情达理的、有礼貌的、有责任感的、尊重的, 描述了个体善良尊重的优秀品质, 命名为“善良尊重”。S2 因素包括包容的、共情的、换位思考的、乐于助人的、礼让的、利他的, 描述了对待他人的行为表现, 命名为“包容理解”。S3 因素包括积极主动的、乐观开朗的、外向的、胸襟开阔的、有信心的, 描述了个体乐观向上、对外开放的品质, 命名为“积极开放”。

3.3.4　信效度检验

社会善念及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91, 0.87, 0.80, 0.82, 均在 0.8 以上, 表明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相关系数为 0.82~0.90, 高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 表明聚合效度很好, 均为测量同一特质; 同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6~0.77, 属于中等相关, 表明区分效度良好, 该特质可以分为不同维度测量,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同时, 研究采用 HEXACO 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分量表, 以及一般信任问卷、移情关怀和观点采择分量表作为效标, 结果表明均存在显著相关。具体见表 3。表明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但鉴于社会善念概念比较新, 词汇表达具有抽象性, 对新概念理解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 且社会善念强调的情境化在词汇中不能得到充分展示, 故接下来在词汇结构的基础上, 参照心理学量表的编制方法, 将抽象词汇转换为情境描述, 扩展成为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同时进一步验证其心理结构。

4　研究 3: 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再验证及自陈量表编制

4.1　研究目的

在研究 1 和 2 的基础上, 编制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继续探索和验证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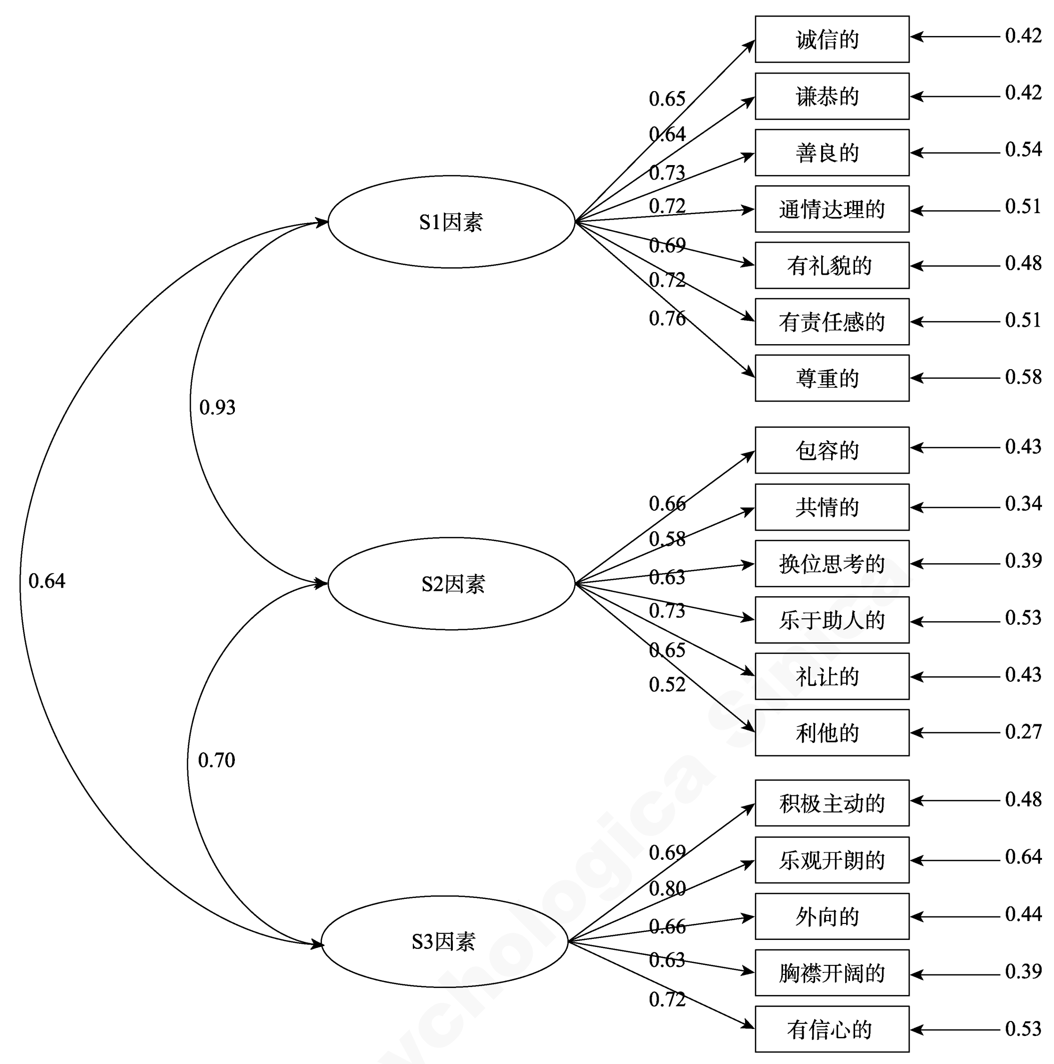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善念的三因素心理结构

表 2 社会善念心理结构各模型拟合指标比较表

模型	χ^2	df	χ^2/df	RMR	GFI	IFI	TLI	CFI	RMSEA
单因素模型	593.04	135	4.39	0.06	0.80	0.82	0.79	0.81	0.11
双因素模型 1	394.04	134	2.94	0.04	0.87	0.89	0.88	0.89	0.08
双因素模型 2	541.37	134	4.04	0.05	0.81	0.83	0.81	0.83	0.10
三因素模型	379.08	132	2.87	0.04	0.90	0.93	0.91	0.93	0.06

表 3 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总分、各维度及效标之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社会善念	–								
2. 善良尊重	0.90**	–							
3. 包容理解	0.89**	0.77**	–						
4. 积极开放	0.82**	0.57**	0.56**	–					
5. 诚实–谦恭	0.22**	0.24**	0.21**	0.12*	–				
6. 宜人性	0.41**	0.30**	0.36**	0.41**	0.37**	–			
7. 信任	0.60**	0.52**	0.53**	0.52**	0.24**	0.36**	–		
8. 移情关怀	0.30**	0.33**	0.33**	0.13*	0.23**	0.24**	0.27**	–	
9. 观点采择	0.53**	0.46**	0.53**	0.38**	0.23**	0.39**	0.38**	0.17**	–

注: ** $p < 0.01$, * $p < 0.05$。

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平台招募, 删除作答速度过快或过慢、选择同一选项、随机有规律作答, 以及在陷阱题“看到此题, 请选择不符合”作答不正确的被试。样本一: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实际被试 405 名, 有效被试 377 名。男性 239 名, 女性 138 名。年龄 18~54 岁(M = 26.74, SD = 7.23)。样本二: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实际被试 225 名, 有效被试 220 名。男性 164 名, 女性 56 名。年龄 17~52 岁(M = 25.98, SD = 8.49)。

4.2.2 研究程序

首先, 编制初测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1)在查阅社会善念文献的基础上, 搜集整理相关的国内外成熟心理量表; 2)基于上述研究所确立的社会善念词表, 将词汇进行情景扩展。3)结合前期所收集的开放调查中被试对于高/低社会善念者的典型描述进行整理汇总。结合这三方面内容, 由研究者和 1 位心理学教师、2 位硕士研究生初步编制反映社会善念的自陈描述 331 条(其中包括 25 条反向描述)。4)初步项目编制完成后, 邀请 2 位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对所有项目进行评判筛选, 筛选原则首先要阅读流畅便于理解, 然后合并相似的表达, 删减比较另类的或者不具有普适性的表达。5)挑选能很好反映社会善念理论构想的项目, 保留存疑的项目。形成 62 条描述, 初步编制社会善念自陈量表题目。6)邀请 5 位硕士研究生和 3 位非心理学领域的教育专家, 对整个量表的指导语、各个题目描述进行评价。7)由研究者和 1 位社会心理学教师基于社会善念的理论模型删减合并, 最终保留 35 条描述, 形成初测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然后, 对样本一进行施测, 要求被试从 1 到 5 级评定这些表述符合自己日常心理或行为的程度(1 = 非常不符合, 5 = 非常符合)。采用 SPSS 20.0 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指标不好或模型拟合不佳的项目进行删减, 最终保留 17 项描述。

最后, 检验社会善念自陈量表(Social Mindfulness Self-Report Scale, SMSRS), 效标工具采用 HEXACO 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分量表(Lee & Ashton, 2018)、一般信任问卷(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人际反应指数的观点采择和移情关怀分量表(Davis, 1983; 戎幸 等, 2010; 张凤凤 等, 2010)、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The SVO Slider Measure) (Murphy et al., 2011)。对样本二进行施测, 采用 AMOS 20.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 SPSS 20.0 进行一致性信度分析, 再次验证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确定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4.3 研究结果

4.3.1 项目分析

结果发现, T26“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高分组与低分组差异不显著, 且题总相关系数较低, 故删除。

4.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初测社会善念自陈量表进行分析。KMO 值为 0.93, Bartlett 球性检验结果显著(χ^2 = 5238.31, df = 561, p < 0.001), 表明该量表的项目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优斜交转轴法对 34 条项目进行因素分析, 发现共有 8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 解释总变异率达到 60.52%。

基于研究 2 的筛选标准步骤, 最终保留 17 个项目。对这 17 个项目进行碎石图检验, 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有 4 个因子, 累积解释总变异达到 58.11%, 特征值到 5 以后开始平缓。同时, 各项目载荷值在 0.49~0.93 之间。具体因子载荷和共同度如表 4 所示。

4.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研究采用 AMOS 20.0 对四因素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 该模型的 χ^2/df 小于 3, RMR 小于 0.05, GFI、IFI、TLI、CFI 均大于 0.90, RMSEA 小于 0.08, 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具体模型结构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 该结构与研究 2 的三因素模型存在差异, 因此考虑将因素一和因素四合并, 建构三因素模型结构。另外前人研究表明二阶模型比一阶模型更具有测量统计和结构解释的简约性(侯杰泰 等, 2004), 可以用更上位概念解释一阶因素。故再建构二阶四因素和二阶三因素模型。研究对建立的四个竞争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以看出, 四因素模型的拟合表现好于三因素模型。但是仅从以上指标无法判断一阶四因素模型和二阶四因素模型(等价模型)的优劣。有研究者提出可以使用交叉效度分析和阿凯克信息准则进一步比较模型, 采用 ΔECVI 和 ΔAIC 作为选择模型的指标, 两个值越小, 表明拟合越好(柳恒超 等, 2007), 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 6 看出, 二阶四因素模型和一阶四因素模型的优劣指标差异微小。但是从理论上讲, 一阶模型仅表明社会善念包括 4 个维度, 且两两之间相关

表 4　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的四因素结构表

项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共同度
T21 我经常能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	0.93				0.77
T19 我经常能够换位思考。	0.75				0.64
T 20 我经常能够理解和包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	0.73				0.59
T 22 我经常能主动帮助他人。	0.65				0.54
T 34 有奖励的名额，我一般都会让给别人。		0.80			0.61
T 33 我做了好事后不会主动去宣扬。		0.70			0.53
T11 我从不强求别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0.61			0.50
T12 我从不因为取得成就而骄傲自满。		0.59			0.55
T27 我一般会先让别人做选择，自己再选。		0.49			0.35
T6 对待生活和工作，我是乐观开朗的。			0.88		0.69
T14 我对于未来的生活信心百倍。			0.83		0.70
T15 我跟同事或同学关系良好。			0.61		0.59
T18 我会积极主动地工作或学习。			0.60		0.54
T32 我遵守社会秩序。				0.82	0.64
T31 我尊重他人的选择。				0.68	0.66
T36 自己能解决的事情，我从不麻烦别人。				0.65	0.51
T35 在公共场合我经常为老弱病残孕让座。				0.61	0.48
特征值	5.78	1.58	1.29	1.23	
贡献率%	33.97	9.29	7.60	7.25	
累积贡献率%	33.97	43.26	50.86	58.11	

注：因素负荷值低于 0.40 者没有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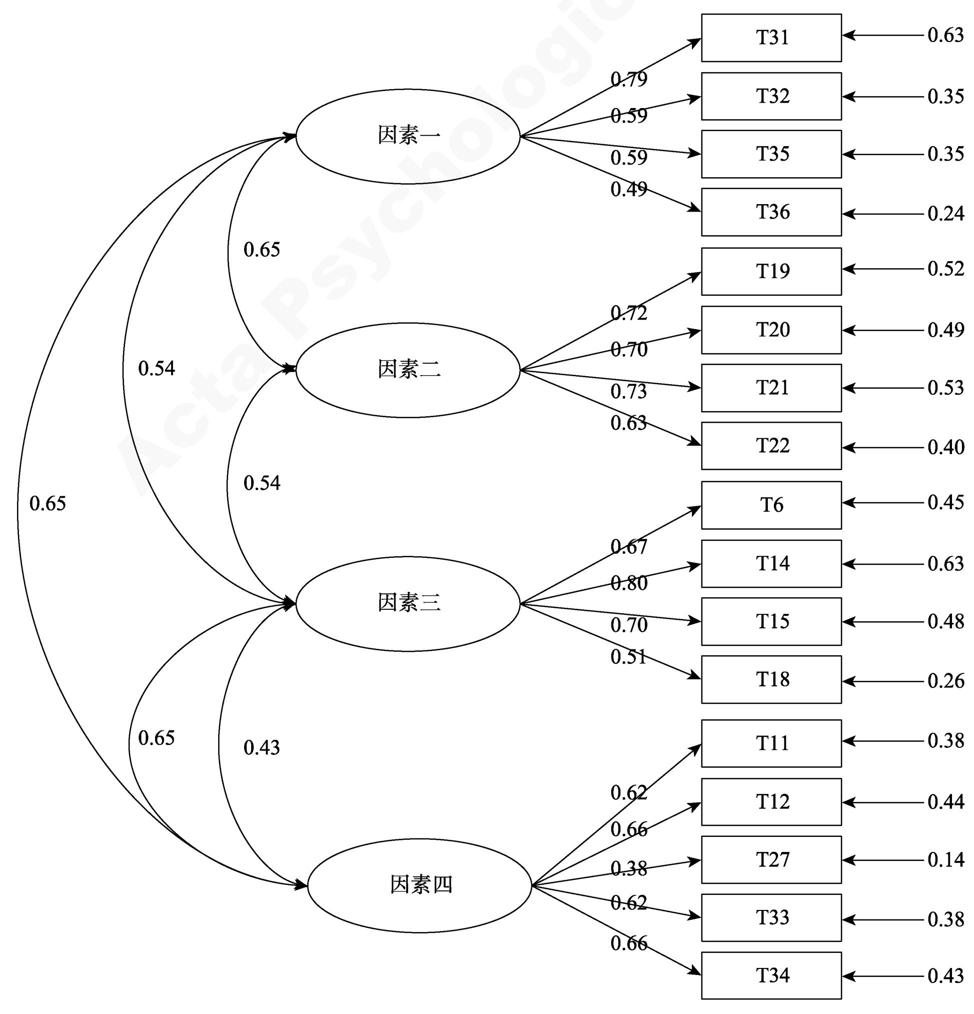


图 3　社会善念自陈量表四因素结构

表 5　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竞争模型拟合指标比较表

模型	χ^2	*df*	χ^2/df	RMR	GFI	IFI	TLI	CFI	RMSEA
一阶三因素模型	263.02	116	2.27	0.05	0.87	0.87	0.84	0.87	0.08
二阶三因素模型	263.02	116	2.27	0.05	0.87	0.87	0.84	0.87	0.08
一阶四因素模型	209.69	113	1.86	0.04	0.90	0.91	0.90	0.91	0.06
二阶四因素模型	211.61	114	1.86	0.04	0.90	0.91	0.90	0.91	0.06

表 6　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竞争模型优劣指标比较表

模型	ECVI	$ECVI_{饱和}/ECVI_{独立}$	ΔECVI	AIC	$AIC_{饱和}/AIC_{独立}$	ΔAIC
一阶三因素模型	1.54	1.40/5.78	0.14	337.02	306/1266.30	47.41
二阶三因素模型	1.54	1.40/5.78	0.14	337.01	306/1266.30	47.40
一阶四因素模型	1.32	1.40/5.78	0.08	289.69	306/1266.30	0.08
二阶四因素模型	1.32	1.40/5.78	0.08	289.61	306/1266.3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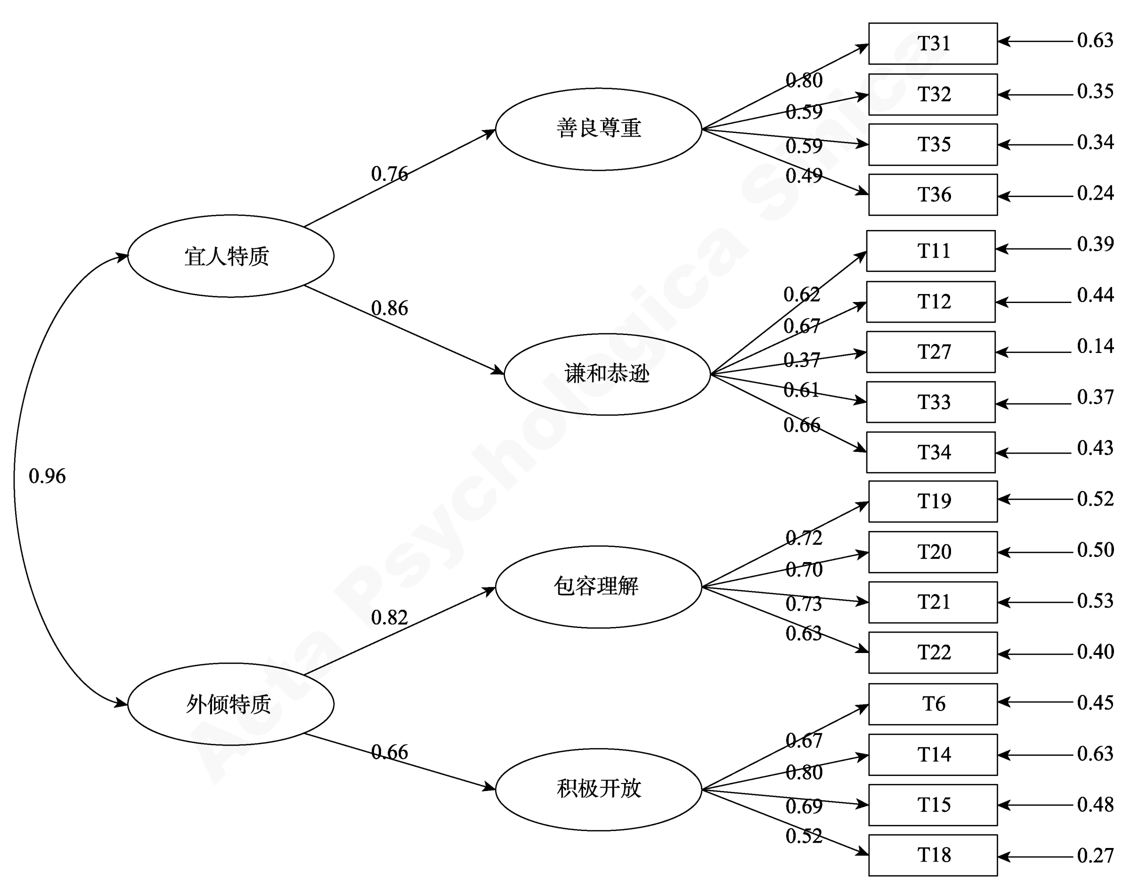


图 4　社会善念的二阶四因素心理结构

较高；而二阶模型则进一步解释了这种相关的来源——在两个维度之上各存在一个总的特质因素，它决定和影响了其下的两个维度。因此，研究在指标验证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确定社会善念的二阶四因素结构模型。

因素一、二、三与研究 2 社会善念的词汇结构相一致，特别注意的是因素四。这一因素更多体现的是个体的谦逊特质，这一点在词汇结构的第一因素中有涉及，但未能独立体现，融合在了“善良尊重”维度。同时，被试对个体谦逊的情境描述较多，在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的因素旋转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载荷，故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维度，将其独立出来，命名为“谦和恭逊”。

同时结合二阶四因素结构模型的结果，将“善良尊重”和“谦和恭逊”上位概念界定为“宜人特质”，将“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上位概念界定为“外倾特质”。

最终建构的二阶四因素结构模型图如图 4 所示。

4.3.4 信效度检验

社会善念及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谦和恭逊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86, 0.70, 0.78, 0.75, 0.72，均在 0.7 以上，表明社会善念自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相关系数为 0.74~0.79，高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表明聚合效度很好，均为测量同一特质；同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35~0.5，属于中等相关，表明区分效度良好，该特质可以分为不同维度测量。总之，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同时，研究采用 HEXACO 诚实−谦恭分量表和宜人性分量表，以及一般信任特质、移情关怀和观点采择量表、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作为效标，结果表明均存在显著相关。具体如表 7 所示。表明社会善念自陈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5 讨论

社会善念，相对于大五人格或大六人格这种广义特质(broad trait)，隶属于狭义特质(narrow trait)。研究者认为颗粒度越细、范围越窄、定义越明确的特质变量，其实证结果的概念清晰度和可解释性就越高(Ones & Viswesvaran, 1996)。

5.1 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5.1.1 一阶结构初探

研究通过词汇研究法探讨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确立了社会善念的词库，获得三因素结构：善良尊重、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结合调查法、问卷法，加入情境元素编制题目，发现社会善念的四因素结构，两者在善良尊重、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的心理结构相同，但在谦和恭逊维度存在差异，原因在于：第一，因人格词汇的抽象性，有“谦恭”等词汇被融合到“善良尊重”中，但在自陈量表的项目中体现了互动情境因素，具有社会互动的动态结构，故对“谦和恭逊”的人格特质就有所凸显。第二，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来看，该因素的载荷非常独立而且显著，有较多研究者也发现了社会善念与大六因素中的诚实−谦恭的高相关性(Mischkowski et al., 2018; 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因此，在前人研究和本研究实证结果的基础上，研究将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确定为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和谦和恭逊四个因素，分别指个体内在的善良、对他人的理解、对世界的开放和自我的谦逊。

5.1.2 人际特质与二阶结构

Wiggins (1979)指出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类别就是人际特质(interpersonal traits)。很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概念界定，认为人际特质是由周围环境定义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人感知他人的动机倾向，从而影响行动意愿和行为动力(Ansell & Pincus, 2004; Brown et al., 2004; Gaines, 1996; Gurtman, 2009; 赵菊, 佐斌, 2013)。这一解释很好地契合了社会善念的概念界定，故本研究认为社会善念隶属于人际特质。

同时，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和外倾性被认为是最基本、最经典的人际特质，可涵盖大多数人际特质(Mccrae & Costa, 1989)。依据人格的两高阶因素(Two higher-order factors of personality)，有研究者在大五人格中发现了两个不相关的高阶因子的证据(DeYoung, 2006)，将其标记为稳定性(Stability)和可塑性(Plasticity)。前者是指情绪和行为的稳定

表 7 社会善念自陈量表总分、各维度及效标之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社会善念	–										
2. 善良尊重	0.74**	–									
3. 包容理解	0.74**	0.43**	–								
4. 积极开放	0.77**	0.43**	0.45**	–							
5. 谦和恭逊	0.79**	0.35**	0.50**	0.48**	–						
6. 诚实−谦恭	0.34**	0.20**	0.22**	0.19**	0.41**	–					
7. 宜人性	0.51**	0.53**	0.27**	0.34**	0.37**	0.39**	–				
8. 信任	0.59**	0.59**	0.44**	0.36**	0.40**	0.23**	0.39**	–			
9. 移情关怀	0.26**	0.20**	0.30**	0.18**	0.15*	0.23**	0.25**	0.30**	–		
10. 观点采择	0.60**	0.43**	0.38**	0.64**	0.38**	0.21**	0.41**	0.35**	0.13	–	
11. 社会价值取向	0.16*	0.04	0.02	0.15*	0.23**	0.25**	0.21**	0.10	0.15*	0.11	–

注：**$p < 0.01$, *$p < 0.05$。

调节基础，指向情绪稳定、宜人或尽责，而后者是探索和积极行为的基础，指向外向性或经验的开放性。故此，研究所确定的二阶四因素结构模型中，将善良尊重和谦和恭逊归类为宜人特质，将积极开放和包容理解归类为外倾特质。

此外，人际交往中存在着人格互补规律(许燕，1992)，而环形模型(cricumplex model)作为人格因素互补模型(Trapnell & Wiggins, 1990)，为人际特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合的视角(黄飞 等, 2010)。Wiggins (1979, 2003)开发的人际特质测量工从"爱–恨"、"控制–顺从"的维度进行划分。未来研究可将社会善念的因素结构整合到环形模型中，从爱与接受的角度对其人际特质进行无缝解读。

5.2　社会善念与中国文化发展

杨波(1999)认为"中国人人格形成和变化的机理，嵌埋于传统文化积淀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充分反映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

社会善念中的"善良尊重"和"谦和恭逊"充分反映我国的传统文化。《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尹文子·大道上》"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这些传统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善良文化，也在行善的同时尊重他人，与人为善，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行善。《周易》谦卦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朱子语类》卷七十说："大抵人多见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谦则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朱熹认为谦逊者在认清自身长处和别人短处后，才能放低自己，与他人平等相处。在中国人心中，谦逊是传统美德，是生活感悟，也是理想人格的道德诉求(苗元江，梁小玲, 2012)。《论语·学而》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宽容礼让、谦虚善良的道德传统，即形成了讲"礼"而"和为贵"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优秀传统美德。

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变迁和飞速发展，现代中国文化也发生着变化。而社会善念的"包容理解"和"积极开放"正是在现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鲜明体现。针对中国人的"现代人格"的测查，结果表明，当代中国人对他人更为包容，多元化取向增强，而人情、面子等传统文化相关的特质水平在降低(周明洁，张建新，2007)。同时高旭繁和杨国枢(2011)也指出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人格心理也从遵从权威、安分守成等传统人格向平等开放、乐观进取等方面转变。这些研究均体现了在现代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具有包容开放的人格特质，这与本研究提出的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外倾特质"相契合。

5.3　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的意义

探究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对后续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中国人社会善念心理结构的探索，进一步明确了在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善念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的结构，丰富了中国人关于善良、谦逊等美德相关的人格理论，对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格与社会特质理论研究有一定的补充。其次，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为中国文化下人格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对于强调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交互环境的人格特质，探索了一条如何在超越情境的条件下建构内部心理结构的路径。第三，研究所探索验证的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宜人和外倾特质的高阶理论，是对当前人格高阶因素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为人格的高阶因素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社会善念高阶人格特质结构有助于厘清不同维度上与其他相关变量(例如认知、情绪等)的关系，为将来探索社会善念影响其他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研究基础。第四，经过三个研究研发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为社会善念领域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教育领域，社会善念契合尊重教育、同理心教育、共情教育、美德教育的理念，丰富了积极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曾光，赵昱鲲, 2018)。在组织领域，为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营造信任的组织氛围和开设员工成长培训体系提供新的视角。在社会领域，低成本的社会善念并不需要国家或者民众做出很大的牺牲，或可助力达成和平、和谐的社会治理目的。特别是在建构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社会善念对于营造"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具有积极作用。

5.4　不足与展望

研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通过对不同群体进行开放调查、词汇收集，严格按照结构探索流程，从词汇和语句描述两个层面，全面验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善念心理结构。但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主要依赖被试的自我报告或假设情境反应，它们与实际行为的关联有待重复论证(Baumeister et al., 2007)。其次，社会善

念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经过心理学规范流程开发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其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展验证。尤其是对影响社会善念的相关因素需要更加系统的探索。最后，随着当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协同发展，未来可以社会善念所反映的低成本小善为契机，结合竞争合作转换、社会互动秩序、文化价值观等多层面，探究其文化哲学背景和生态意义，以期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6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确立 40 个人格特质词的社会善念词库，包括36个高社会善念词和4个低社会善念词，为中国文化下的社会善念研究提供了基础词汇编码依据。

(2)中国人的社会善念具有二阶四因素结构，包括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和谦和恭逊四个因素，分别从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两个层面阐释了其心理结构。

(3)编制的社会善念词汇评定量表和自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测量学标准，可作为该领域研究的测量工具。

参 考 文 献

Ansell, E. B., & Pincus, A. L. (2004).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 examination using the structural summary method for circumplex data.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2), 167–201.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 Funder, D. C. (2007). Psychology as the science of self-reports and finger movements: Whatever happened to actual behavi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396–403.

Brown, H. G., Poole, M. S., & Rodgers, T. L. (2004). Interpersonal traits, complementarity, and trust in virtual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4), 115–138.

Cai, H. J., Huang, Z. H., Lin, L., Zhang, M. Y., Wang, X. O., Zhu, H. J., … Jing, Y. M. (2020).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 literature review.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0), 1599–1618.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 敬一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1618.]

Cawley, M. J., Martin, J. E., & Johnson, J. A. (2000). A virtues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5), 997–1013.

Chang, N. D. (2019).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China.

[常乃悳. (2019). *中国思想小史.* 哈尔滨出版社.]

Chen, M. Q. (2016). Social mindfuln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rality.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151–164.

[陈满琪. (2016). 社会正念及其与道德关系的研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151–164.]

Chen, Q., Chen, B., Liu, L., Zhao, Y. F., & Wu, Z. H. (2020).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oxytocin on social mindfulnes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3*(3), 712–717.

[陈琪, 陈冰, 刘来, 赵玉芳, 吴宗辉. (2020). 催产素对社会善念的提升作用. *心理科学, 43*(3), 712–717.]

Davis, M. H. (198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113–126.

DeYoung, C. G. (2006). Higher-order factors of the Big Five in a multi-informant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6), 1138–1151.

Dou, K. (2016). *Perceived social mindfulness: An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o promote cooperative behaviors*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窦凯. (2016). *感知社会正念: 有效促进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 (博士学位论文). 暨南大学.]

Dou, K., Liu, Y. Z., Wang, Y. J., & Nie, Y. G. (2018).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Emotion enhancement mechanism of perceived social mindfulness on cooperative behaviour.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0*(1), 101–114.

[窦凯, 刘耀中, 王玉洁, 聂衍刚. (2018). "乐"于合作: 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 *心理学报, 50*(1), 101–114.]

Dou, K. Nie, Y. G., Wang, Y. J., & Liu, Y. Z. (2018). Trust or defence?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mindfulness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during interactive gam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2), 390–396.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刘耀中. (2018). 信任还是设防?互动博弈中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 *心理科学, 41*(2), 390–396.]

Dou, K., Nie, Y. G., Wang, Y. J., & Zhang, Q. P. (2017). Social mindfulness in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nceptualization, assessment and influenced mechanism. *Advances in Psychology, 7*(9), 1101–1112.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张庆鹏. (2017). 人际互动中的社会善念: 概念、测评及影响机制. *心理学进展, 7*(9), 1101–1112.]

Gaines, S. O. (1996).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and gender-role compliance on interpersonal resource exchange among dating and engaged/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2), 241–261.

Gurtman, M. B. (2009). Exploring personality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4), 601–619.

Hashimoto, H., Li, Y., & Yamagishi, T. (2011). Beliefs and preferences in cultural agents and cultural game player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140–147.

Higgins, E. T. (1997).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12), 1280–1300.

Higgins, E. T. (1998).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pp. 1–46): Elsevier.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u, J. T., Wen, Z. L., & Cheng, Z. J.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Huang, F., Li, Y. H., Zhang, J. X., & Zhu, H. L. (2010). Circumplex model: An approach to integrate personality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 132–143.

[黄飞, 李育辉, 张建新, 朱浩亮. (2010). 环形模型: 整合人格研究的一种取向. *心理科学进展, 18*(1), 132–143.]
Huang, X. T. (2004). Reflections on Chinanization of personality studies.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0*(6), 5–9.
[黄希庭. (2004). 再谈人格研究的中国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30*(6), 5–9.]
Jiao, L. Y., Yang, Y., Xu, Y., Gao, S. Q., & Zhang, H. Y. (2019). Good and evil in Chinese culture: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connot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1*(10), 1128–1142.
[焦丽颖, 杨颖, 许燕, 高树青, 张和云. (2019). 中国人的善与恶: 人格结构与内涵. *心理学报, 51*(10), 1128–1142.]
Kao, S. F., & Yang, K. S. (2011). A critical review of 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Journal of education of Z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100*(19), 1–11.
[高旭繁, 杨国枢. (2011). 华人心理传统性与心理现代性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彰化师大教育学报, 100*(19), 1–11.]
Kim, H., & Markus, H. R. (1999). Deviance or uniqueness, harmony or conformity? A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4), 785–800.
Lee, K., & Ashton, M. C. (2018).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EXACO-100. *Assessment, 25*(5), 543–556.
Liang, S. M. (2010).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梁漱溟. (2010).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Liu, H. C., Xu, Y., & Wang, L. (2007). The principal and methods of model selection in application of SEM.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27* (1), 75–78.
[柳恒超, 许燕, 王力. (2007). 结构方程模型应用中模型选择的原理和方法. *心理学探新, 27*(1), 75–78.]
Lockwood, P., Jordan, C. H., & Kunda, Z. (2002). Motivation by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models: Regulatory focus determines who will best inspire 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4), 854–864.
Mccrae, R. R., & Costa, P. T. (1989).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Wiggins's circumplex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4), 586–595.
Miao, Y. J., & Liang X. L. (2011). Research on Modesty in Positive Psycholog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5), 7–9.
[苗元江, 梁小玲. (2011). 积极心理学领域中的谦虚研究.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5), 7–9.]
Mischkowski, D., Thielmann, I., & Glöckner, A. (2018). Think it through before making a choice? Processing mode does not influence social mindful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4*, 85–97.
Mu, S. K.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es Adjective Rating Scale and its applied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沐守宽. (2007). *美德形容词评定量表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Murphy, R. O., Ackermann, K. A., & Handgraaf, M. J. J. (2011). Measuring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6*(8), 771–781.
Ones, D. S., & Viswesvaran, C. (1996). Bandwidth–fidelity dilemma in personality measurement for personnel selec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7*(6), 609–626.
Ren Y. (2017). The review of altruistic option of social mindfulness. *The Guide of Science & Education, 14*(5), 147–148.
[任彧. (2017). 社会正念中的利他选择综述. *科教导刊, 14*(5), 147–148.]
Rong, X., Sun, B. H., Huang, X. Z., Cai, M. Y., & Li, W. J. (2010).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of Chinese version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2), 158–160.
[戎幸, 孙炳海, 黄小忠, 蔡旻颖, 李伟健. (2010). 人际反应指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58–160.]
Russell, B. (2016).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罗素. (2016). *西方哲学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Shryack, J., Steger, M. F., Krueger, R. F., & Kallie, C. S. (2010). The structure of virtu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virt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6), 714–719.
Tian, Y., Wang, L., & Xu, Y. (2020).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 of social mindfulness. *Advances in Psychology, 10*(8), 1069–1078.
[田一, 王莉, 许燕. (2020). 社会善念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心理学进展, 10*(8), 1069–1078.]
Trapnell, P. D., & Wiggins, J. S. (1990). Exten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adjective scales to include the big five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4), 781–790.
Triandis, H. C. (201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Routledge.
van Doesum, N. J. (2016). *Social Mindfulness*. Ipskamp drukkers BV.
van Doesum, N. J., de Vries, R. E., Blokland, A. A. J., Hill, J. M., Kuhlman, D. M., Stivers,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9). Social mindfulness: Prosocial the active wa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5*(2), 183–193.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103.
van Doesum, N. J., van Prooijen, J. W., Verburgh, L., & van Lange, P. A. M. (2016). Social hostility in soccer and beyond. *Plos One, 11*(4), 1–13.
van Lange, P. A. M., & van Doesum, N. J. (2015). Social mindfulness and social hostility.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8–24.
Wang, D. F., & Cui, H. (2005).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personal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王登峰, 崔红. (2005). *解读中国人的人格.*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ang, D. F., & Cui, H. (2005). Exploring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1*(5), 5–16.
[王登峰, 崔红. (2005). 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探索——中国人个性量表与中国人人格量表的交互验证.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1*(5), 5–16.]
Wang, P. P. (2011).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based on verbs*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王萍萍. (2011). *基于动词的人格模型探索*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Weidman, A. C., Cheng, J. T., & Tracy, J. L. (2018).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4*(1), 153–178.
Wiggins, & Jerry, S. (1979). A psychological taxonomy of trait-descriptive terms: The interperson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3), 395–412.
Wiggins, J. S. (2003). *Paradigms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Xiong, M. M., Wang, F. Y., & Cai, R. X. (201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sty Scale (CM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14.
Xu, Y. (1992). A review of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theory.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 8–14.
[许燕. (1992). 人际互补理论评介. *心理学探新,* (3), 8–14.]
Yamagishi, T., & Yamagishi, M.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2), 129–166.
Yang, B. (1999). *Chi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Beijing: XinhuaPublishing House.
[杨波. (1999).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北京: 新华出版社.]
Yang, K. S. (2004). *Siniczation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杨国枢. (2004).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本土化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Yang, K. S., & Yu, Z. H. (2008). Indigenous personality research: The Chinese case.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192–222.
[杨国枢, 俞宗火. (2008). 本土人格研究: 中国的情况.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192–222.]
Zeng, G., & Zhao, Y. K. (2018).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education.* Beijing: China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publishing group &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
[曾光, 赵昱鲲. (2018). *幸福的科学: 积极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 北京: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Zhang, F. F., Dong, Y., Wang, K., Zhan, Z. Y., & Xie, L. F. (2010).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2), 155–157.
[张凤凤, 董毅, 汪凯, 詹志禹, 谢伦芳. (2010).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55–157.]
Zhang, H. Y., Zhao, H. H., & Xu, Y. (201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virtuous personality and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8*(3), 221–227.
[张和云, 赵欢欢, 许燕. (2018). 中国人善良人格的结构研究. *心理学探新, 38*(3), 221–227.]
Zhang, J. X., & Zhou, M. J. (2006). Searching for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Chinese: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a six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trai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4), 574–585.
[张建新, 周明洁. (2006). 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心理科学进展, 14*(4), 574–585.]
Zhao, H. H., Xu, Y., & Zhang, H. Y. (201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it awe.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9*(4), 345–351.
[赵欢欢, 许燕, 张和云. (2019). 中国人敬畏特质的心理结构研究. *心理学探新, 39*(4), 345–351.]
Zhao, J., & Zuo, B. (2013). Analysis on circumplex model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3*(1), 57–62.
[赵菊, 佐斌. (2013). 人际关系互动中人际特质的环形模型探索. *心理学探新, 33*(1), 57–62.]
Zhou, M. J., & Zhang, J. X. (2007).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of Chinese people's personaliti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03–210.
[周明洁, 张建新. (2007).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与中国人群体人格变化模式. *心理科学进展, 15*(2), 203–210.]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mindfulness in Chinese culture

TIAN Yi[1,2], WANG Li[3], XU Yan[2], JIAO Liying[2]

([1] *Bei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Quality Assessment,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6,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Social mindfulness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sense others' states dur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his or her willingness to respect others' choices, and his or her ability to transfer rights.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mindfulnes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is important for cultivating a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mindfulness with a lexical method. In Study 1, 59 high- and 24 low-social mindfulness words were selected by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multiple rounds of discussions. After being evaluated by 43 professionals and 232 nonprofessionals, 40 social mindfulness words were selected. In Study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with Sample 1 (n = 351)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ith Sample 2 (n = 307) were conducted to obtain a three-factor structure for social mindfulness; these structures include kindness and respect,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and optimism and open-mindedness. Additionally, a social mindfulness lexical rating scale (SMLRS) with 18 words was formed. In Study 3, we used the same method as in Study 2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mindfulness (EFA: Sample 1, n = 377; CFA: Sample 2, n = 220) through scenario descriptions. Then, a new 17-item social mindfulness self-report scale (SMSRS) and a model with two second-order factors and four first-order factors fo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mindfulness were generated. Both the SMLRS and SMSRS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an be used as measurement tools in follow-up research.

Through lexical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analysis, we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mindfulness, which contains two second-order factors and four first-order factors, in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model, the two second-order factors were agreeableness and extraversion, and the four first-order factors were kindness and respect, humility, optimism and open-mindedness, and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we established a vocabulary of social mindfulness, verified social mindfulness's second-order four-factor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provided a new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higher-order 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 and enriched our knowledge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mindfulnes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moral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employees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ality in the sociology field.

Key words　social mindfulness;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lexical method; Chinese culture